



铭记传承沂蒙精神

□ 厉彦林



2013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 “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是山东党政军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共同铸就的伟大革命精神, 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传承、发展和提升,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政治追求、真挚为民情怀和兴旺发达的“奥秘”。

红色热土、精神家园

沂蒙精神孕育形成于以沂蒙为中心的山东革命根据地。在沂蒙这片红色热土上, 无数英雄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沂蒙红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群体。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的沂蒙红嫂纪念馆, 珍藏着200多位红嫂的感人故事。倾听讲解员讲述红嫂们的动人故事, 每一位参观者都为之感动不已。

“红嫂”的称谓, 起源于沂南县妇女明德英的故事。明德英出身贫困农民家庭, 两岁时因病致哑, 但耳朵却特别灵敏, 头脑里有的是是非曲直。全国抗战爆发后, 她在家乡目睹了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一切为了民众的实际行动, 从而对共产党八路军怀有深厚感情。1941年11月, 日寇“扫荡”时, 她机智地躲过日本兵的搜查, 在她看守的墓穴里, 抢救了一位遍体鳞伤的八路军战士。当时, 因为重伤失血过多, 小战士已经缺水休克。周围没有水源, 外边还有搜查的日本兵, 在这人命关天的危急时刻, 明德英毅然放下怀中嗷嗷待哺的儿子, 用乳汁救活了奄奄一息的小战士。后来她和丈夫李开田倾其所有, 精心照料这位八路战士半个多月, 使其伤愈重返前线, 这便是红嫂“乳汁救伤员”的故事原型。

这个革命年代的传奇故事感动了无数人。1964年8月12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了京剧现代戏《红嫂》后说, 《红嫂》这出戏是反映军民鱼水情的戏, 演得很好, 要拍成电影, 教育更多的人, 做共和国的新红嫂。从此红嫂的

故事被改编成电影、戏剧和舞蹈等, 沂蒙红嫂家喻户晓, 沂蒙山也名扬四海。

2017年8月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深情地引用了在沂蒙山区广为传唱的民谣: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 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 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在革命战争年代, 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前赴后继, 浴血奋战, 建立起党群干群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 铸就了伟大的沂蒙精神。这里不仅有红嫂、沂蒙母亲、“沂蒙六姐妹”, 还有“红哥”等支前模范群体……英雄的沂蒙人民, 用实际行动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感人至深的篇章。陈毅元帅曾深情慨叹: “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 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在异常残酷的战争年代,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这种关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沂蒙革命老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党群关系越来越密切、人民生活质量越来越好? 这需要我们从漫长坎坷的历史脉络中寻找答案。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我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 战乱频仍、民不聊生, 农民命运更加悲惨。山东是最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地区之一。自1923年起, 沂蒙山区的李清淮、李清漪、刘晓浦、刘一梦、冷相佑、刘之言等就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中共山东省委(后改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中共山东分局)进驻沂蒙山区, 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当时沂蒙大地土匪蜂起、群盗为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各种势力丛生, 有日寇, 有国民党, 有八路军, 有地主武装, 还有土匪力量。沂蒙人民在如此残酷复杂的环境中为什么铁了心听党话、跟党走? 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党和人民

军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经济上: “分了地, 出了气, 翻了身, 饱了肚皮”。从1942年起, 沂蒙根据地大规模开展起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工工资的群众运动。到1946年底, 山东解放区大部分农民分到了土地。

政治上: 采用“豆选”这种简单的选举方式, 维护了广大群众表达政治意愿的权利。即每位选民一粒黄豆“选票”, 候选人坐成一排, 身后放一个空碗, 选民中意谁就给谁的碗里投豆, 最后根据豆粒多少确定人选。1941年前后,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有统计的71个县府中, 民选县长占94%, 区长占80%, 乡长占70%, 群众扬眉吐气, 挺直腰杆做人。

文化上: “庄户学堂, 让俺眼明心亮”。沂蒙山区的各级党组织特别重视文化教育, 创办了大量抗日小学和正规小学, 还开展识字班、庄户学、冬学、民校等业余教育。

安全上: 危急时刻“共产党和八路军舍命护咱、救咱, 真把我们当亲人”! 八路军将士进村后, 先帮助群众打扫卫生、劈柴、挑水、理发、看病, 宣传党和军队的政策, 平日把丁点好处都留给群众, 危难时刻更是不惜牺牲自己保护群众。1944年农历大年三十拂晓, 临沭县朱村遭到驻临沂日伪军的袭击。“枪声就是命令”, 驻守在附近的八路军滨海军区第四团八连急奔朱村舍命救百姓, 杀敌40余人, 24位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从此该村有一条村规, 大年初一的第一碗饺子不敬天不敬地, 要敬八连牺牲的战士。

党和军队坚持人民至上, 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因而人民感恩、听党话、跟党走, 这是沂蒙精神的核心、灵魂和最鲜明的特征。

从全民族抗战到解放战争期间, 沂蒙人民参军参战、拥军支前, 10万多人血染疆场; 沂蒙妇女做军鞋315万双, 救护伤病员6万人, 掩护革命同志9.4万人。这是沂蒙人民战争年代坚定不移跟党走、与人民军队血肉相连的生动写照。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深刻诠释了党群、军民主体之间的密切关系, 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政治追求、真

挚为民情怀和沂蒙人民感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品格、行动自觉。沂蒙党政军民用生死与共的实际行动, 树立起座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昭示和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植根于人民, 无论任何时候都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沂蒙精神是穿越时空、生命力旺盛的伟大精神

“山东是革命老区, 有着光荣传统, 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 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众多伟大革命精神, 尽管内涵不尽相同, 但其本质内涵和精神实质是贯通的、一致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 成为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条红线。沂蒙精神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沂蒙精神始终与时代同步, 与党同行, 充满朝气活力, 启示当下, 烛照未来。沂蒙精神既是历史的, 更是现实的; 既是永恒的, 更是发展的; 既是特定区域的, 更是全局的。她超越时空和地域, 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经典而鲜活的章节, 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沂蒙老区、齐鲁大地的生动呈现。

《跟着共产党走》这首在抗战岁月诞生于沂蒙山区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的歌曲, 越唱越顺口。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波澜壮阔, 经历百年风雨征程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 党和人民始终心连心,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一定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造令世界瞩目的人间奇迹。

红色记忆



毛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

□ 高玉飞

“空木中藏宝, 执之可文昌。丹青随心动, 万物映纸空”, 这几句诗构成了有趣的文具谜语, 其谜底便是毛笔。毛笔是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传统书画工具, 居“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首, 毛笔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记载历史、创造艺术、传承文化的同时, 毛笔本身也被赋予了鲜活的中华文化象征与内涵。

毛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使用笔的痕迹。1980年, 陕西临潼姜寨村发掘了距今5000多年的墓葬, 出土彩陶上的花纹可以清晰辨认出是毛笔描绘过的痕迹, 这说明五六千年前已经出现了类似毛笔的笔。殷墟出土的文物表明, 就在三千多年前的商王朝, 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毛笔写字, 甲骨文中还发现了“笔”的象形文字。在距今2500年左右的战国中期楚墓中发现了最早的毛笔实物, 说明毛笔在战国时期已被广泛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毛笔名称繁多, 吴国叫“不律”, 燕国叫“弗”, 楚国叫“辛”, 秦国叫“笔”。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定名为“笔”, 一直沿用至今。

史有秦代蒙恬造笔之传说。据古籍记载: “蒙恬始造, 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 鹿毛为柱, 羊毛为被”。在汉代, 人们开始使用在笔杆上刻字、镶嵌的装潢工艺, 出现了“簪白笔”的特殊

形式。东汉蔡邕撰写《笔赋》一书, 对毛笔的选料、制作、功能等作了评述, 这是中国制笔史上第一部专论毛笔制作的著述。随着时代的发展, 毛笔的制作工艺越来越精良, 初用兔毛, 后亦用羊、鼬、狼、鸡、鼠等动物毛。笔杆的制作材料也日益多样, 如竹子、荆条、牛角、珠玉、玳瑁等。宋代以后, 以宣州(今安徽宣城)所产毛笔最为著名。至元代、明代, 浙江湖州制作的“湖笔”风行于世。自清代以来, 湖州一直成为中国毛笔生产制作的重要地区。

作为中国古代的主要书写工具, 用毛笔书写文章、传达思想的功能深为古人所器重。蔡邕在《笔赋》中写道“夫制作上圣, 立则宪者, 莫先乎笔”。古人甚至把笔的作用提高到了治世的高度, 西晋成公绥在《弃故笔赋》中说“治世之功, 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 序自然之情, 即圣人之志, 非笔不能宣, 实天地之伟器也。”写史言事、著书立说便是毛笔这一功能的重要体现。毛笔进而成为学问、才识甚至职业的象征, 人们用秉笔直书形容史家的直录精神; 用笔耕不辍比喻学者的勤奋治学; 用投笔从戎表达从文人到行伍身份的转变……

中国古代书画同源, 作为书法和绘画的工具, 毛笔的柔软性和灵活性使得书画家们得以挥洒自如, 展现各种各样的笔法和风格。美学大师宗白华认为,

中国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 主要因素有两个: 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 二是中国人用的笔。

在中国古代诗词歌赋和绘画创作中, 文人墨客往往都有自己的毛笔偏好和不同技法, 他们借助毛笔, 将诗词的内涵、书法绘画的意境充分展现, 很多作品既呈现了书法的飘逸、深邃、灵秀, 绘画的细腻、舒展、浑厚, 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书画家们的情感、心境与感悟。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其行云流水的笔法, 既深化了文字的意蕴, 又体现了毛笔的无穷魅力。赵孟頫的独特笔法, 使他的字如同活的生命一样, 充满了张力。苏轼云: “书必有神、气、骨、肉、血, 五者阙一, 不为成书也。”毛笔的神奇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中国传统书画的意蕴、气韵、神韵。

所谓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古人对毛笔的钟爱和运用促进了毛笔制作的完善, 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诸多雅致的“学问”。如赋予毛笔雅号: 由《诗经》中的“静女其娈, 贻我彤管”, 而赋之“彤管”之名; 由曹植《薤露行》中的“擗我径寸翰, 流藻垂华芬”, 而赋之“寸翰”之名; 由左思《咏史》中的“弱冠弄柔翰, 卓犖观群书”, 而赋之“柔翰”之名。此外, 还有毛颖、管城子、管城侯等雅号。如对材质用途进

行精致区分: 按照笔头的柔度分毛笔为硬毫、软毫、尖毫; 按照笔锋的长短分为长锋、中锋和短锋。长峰笔, 腹柔软, 贮墨多, 适宜婀娜多姿的线条; 短锋笔, 锋颖短, 贮墨少, 适宜凝重厚实

的点画; 中锋则位于两者之间。而笔的大小要根据字画的大小而定。毛笔的运用还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内涵。如古人认为一款好的毛笔必须有“四德”, 即“尖、齐、圆、健”的特点, 这“四德”隐含着对文人学士“仁义礼智”四德的要求。古人把用毛笔书写和绘画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通过这个过程, 保持心境的平静和专注, 获得内心的愉悦和满足, 从而陶冶情操、提升境界。

毛笔文化承载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审美情趣,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切感悟毛笔文化独有的神韵美感和艺术价值、感悟凝结笔端的民族智慧和历史底蕴, 能够更好地促进我们凝聚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王羲之的真情真性真言

□ 宋利彩

《世说新语》载: “郗太傅在京口, 遣门生与王丞相书, 求女婿……门生归, 白郗曰: ‘王家诸郎, 亦皆可嘉, 闻来觅婿, 咸自矜持。唯有一郎, 在东床上坦腹卧, 如不闻。’”郗公云: “正此好!”访之, 乃是逸少, 因嫁女与焉。”“东床坦腹”不矫揉造作, 遵从内心以本色示人而成为权臣郗鉴的女婿, 典故“东床坦腹”的主人公, 便是我国历史上有“书圣”之誉的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年, 或作303-361年), 字逸少, 琅玕(今山东临沂)人, 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世称“右军将军”。王羲之的父亲是最早倡议晋元帝渡江的淮南太守王旷, 从伯父是权倾一时的司徒王导, 叔父王彬官至右仆射。作为当时第一大家族的王氏子弟, 王羲之却仕途坎坷, 官不过州郡。关于王羲之是否具有经世治国的愿望和才干, 人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他浓郁热情、自然率真的性格特点, 确使他在当时的官场上难以有更大的作为。但他的崇尚自我、真诚自然一旦熔铸到书法创作中, 直抵人心的艺术作品便诞生了。

王羲之少负盛名, 即因为他被当时的名士周顗另眼相看。周顗性情直率刚耿, 因不肯当面为王导向晋元帝求情, 后被王导之从兄王敦杀害。王导后来在整理中书省文书时发现周顗一直在维护他, 沉痛地对家人说: “吾虽不杀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王羲之十三岁的时候曾去拜访周顗, 周顗“祭而弃之”, 在当天的聚会中, 有一道名贵的菜肴烤牛心, 周顗亲自分割, 第一个就给王羲之品尝。王羲之遂名声大噪。“及长, 辩赡, 以骨鲠称”, 等年长一些, 王羲之便以率真耿直的风骨著称。

或许是对周顗之死耿耿于怀, 或许是不满伯父王导的“愤愤之政”, 虽为王氏子弟, 王羲之屡次拒绝王导的举荐出来做官, 而是出于本心, 选择到更加志趣相投的庾亮府中做幕僚。《晋书·庾亮传》称庾亮: “美安容, 善谈论, 性好庄老, 风格峻整, 动由礼节, 闺门之内不肃而成”。庾亮出玄入儒, 具有老庄的外在表现和儒家内涵。对此, 王羲之真心追慕。他一方面修慕名士风范, 常与至交好友登楼理咏、雅集清谈。另一方面在为人和为政上, 王羲之恪守儒家倡导的君子之行, 反对当时名士们推崇的“居官无官官之事, 处事无事事之心”, 主张为官要务实、恤民。他曾和好友谢安共登冶城(今江苏南京附近), 面对浩瀚的江水, 王羲之对谢安说: “今四郊多垒, 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 浮文妨要, 恐非当今所宜。”他认为当今局势紧张, 人人应当尽心竭力, 而虚幻的高论虚废政务, 浮华的文字妨碍机要, 不是当今所应当提倡的。王羲之在临川做太守期间, 他力所能及地为百姓办事。当时, 广东韶关一带百姓纷纷流亡, 王羲之十分重视, 主张废除苛律, 清和为策。应桓温之请做护军将军后, 他关心士卒疾苦, 要求军营里要公役均平, 对于军营中老弱多病或不能温饱者, 都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安置。

王羲之在《深情帖》中写道: “古人云: ‘行其道, 忘其身为’, 真卿今日之语, 政自当豁其胸怀, 然得公平正直耳。”他认为, 为政做官只有胸怀豁达, 才能公平正直, 如果一味顾及自己的得失, 不能忘其身份, 是不适宜为政的。担任会稽内史期间, “时东土饥荒, 羲之辄开仓赈贷”, 他在没有奏请朝廷的情况下即开仓济民, 还多次请求朝廷减轻当地繁重的赋税, 令治下百姓“小得苏息, 各安其业”。为了节约粮食、防止百姓饿死, 王羲之下令“禁酒节粮”, 本郡一年内不得酿酒, 市面上也不得出售酒类。这在士族饮酒成风的东晋, 实难能可贵。但他也因此受到了各方人士的指责非议。为此, 他感慨地写道: “处世不易, 岂惟公道。”

王羲之“忘其身为”讲真言, 即使在“北伐”这件关涉甚广的事件上也不例外。自东晋政权在江南建立, 北伐复国便是东晋朝臣一直绕不过去的话题。永和四年(348年), 桓温以平蜀之功威名大震, 势力迅速做大, 引起朝廷恐惧。为了对抗桓温势力, 朝廷起用扬州刺史殷浩参综朝政, 以抑制桓温。此后, 更是为了阻止桓温北伐而决定任用殷浩担当北伐重任。而殷浩也颇希望借助北伐建功立业、树立威望。虽然对各方意图有清醒的认知, 但王羲之还是明确反对此次北伐。从朝廷角度, 他认为, “今外不宁, 内忧已深”“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 不亡何待?”从百姓角度, 他认为北伐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 大量的人力物力征用势必大大加重江南各地的赋税, 而一些地区相继遭受灾害和饥饿的困扰, 百姓已无法承受更多赋税负担。并且, 他认为殷浩并不具备统军作战的军事才略, “以为必败”。他给会稽王司马昱和殷浩写信劝阻, 均不被采纳。正是在此期间的永和九年(353年), 王羲之写下了名垂千古的《兰亭序》。

王羲之的辞官不做, 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他的任性率真。因不甘屈居扬州刺史王述治下, 王羲之遣人前往朝廷, 提出把会稽郡从扬州独立出来置为越州。永和十一年(355年), 深怀愧疚的王羲之在父母墓前祭奠告灵, 发誓从此绝意仕途, 随即辞去会稽内史职务, 隐居浙东, 优游山水, 弋钓为娱, 寄情诗书, 实现了他在《兰亭序》中期许的“快然自足, 不知老之将至”。

悠闲无事, 王羲之给好友谢万写信说: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 或污身秽迹, 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 遂其宿心, 其为庆幸”。更为值得庆幸的是, 在辗转跌宕的生命历程中, 王羲之亦始终以一种饱含真诚的赤子之心, “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 终成就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一座高峰, 没有辜负他的才华和一生所遇之种种。

和四年(348年), 桓温以平蜀之功威名大震, 势力迅速做大, 引起朝廷恐惧。为了对抗桓温势力, 朝廷起用扬州刺史殷浩参综朝政, 以抑制桓温。此后, 更是为了阻止桓温北伐而决定任用殷浩担当北伐重任。而殷浩也颇希望借助北伐建功立业、树立威望。虽然对各方意图有清醒的

认知, 但王羲之还是明确反对此次北伐。从朝廷角度, 他认为, “今外不宁, 内忧已深”“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 不亡何待?”从百姓角度, 他认为北伐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 大量的人力物力征用势必大大加重江南各地的赋税, 而一些地区相继遭受灾害和饥饿的困扰, 百姓已无法承受更多赋税负担。并且, 他认为殷浩并不具备统军作战的军事才略, “以为必败”。他给会稽王司马昱和殷浩写信劝阻, 均不被采纳。正是在此期间的永和九年(353年), 王羲之写下了名垂千古的《兰亭序》。

王羲之的辞官不做, 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他的任性率真。因不甘屈居扬州刺史王述治下, 王羲之遣人前往朝廷, 提出把会稽郡从扬州独立出来置为越州。永和十一年(355年), 深怀愧疚的王羲之在父母墓前祭奠告灵, 发誓从此绝意仕途, 随即辞去会稽内史职务, 隐居浙东, 优游山水, 弋钓为娱, 寄情诗书, 实现了他在《兰亭序》中期许的“快然自足, 不知老之将至”。

悠闲无事, 王羲之给好友谢万写信说: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 或污身秽迹, 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 遂其宿心, 其为庆幸”。更为值得庆幸的是, 在辗转跌宕的生命历程中, 王羲之亦始终以一种饱含真诚的赤子之心, “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 终成就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一座高峰, 没有辜负他的才华和一生所遇之种种。

